

村庄衰落的诱因及其对 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重庆市G村的调查

李国珍,张应良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市 400715)

摘要:村庄衰落具备多维表现。村庄衰落形成的主要诱因包括:(1)城镇化与非农产业发展的不协调造成村庄发展主体虚置;(2)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相对迟缓加剧了村庄衰落的步伐;(3)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阻碍了城乡同步发展;(4)村庄集体经济逐渐瓦解致使村级政府无力扭转村庄凋敝;(5)农村公共服务后续供给乏力阻碍了农业生产资源在村庄的优化配置。村庄衰落使农村经济发展进程放缓,反过来,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加速了农民向外迁离频率,进一步加剧村庄衰落进程。基于重庆市G村的案例调查发现:村庄衰落使土地耕作更加粗放,农业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农业经营主体缺失致使现代农业发展受阻;村级基层组织的去功能化致使其组织、动员与激励能力下降;村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乏力使农户创业与投资缺乏条件支撑;不断劣化的村庄投资发展环境使非农产业发展受阻,村庄逐步步入恶性循环发展轨道。

关键词:村庄衰落;诱因;影响;重庆市;农村土地制度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5)06-0072-08

一、村庄衰落的内涵

在中国的农村社会生活中,村庄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中国农村的一个基本特质。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重庆市为代表的西部欠发达地区许多村庄出现震荡性变化:留守人口弱质化,农业衰退、大量房屋空置、许多传统民俗文化逐渐流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美丽乡村早已渐行渐远。村庄衰落渐露端倪。解决村庄衰落问题就必须明白村庄衰落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导致西部村庄衰落的原生变量是什么?村庄衰落如何影响农村经济发展?村庄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主要载体,也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依据。基于此,本文以重庆市G村为例对村庄衰落形成的主要诱因及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阐释,以期由政府正确处理城市化、工业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构建乡村发展的新战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与现实素材。

村庄是以血缘、亲缘、宗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以人口、土地、农业、文化、村域为基本构成要素并具备经济、政治、社会属性的共同体,是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产、生活及文娱的基本活动

收稿日期:2015-04-27

作者简介:李国珍,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通讯作者:张应良,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2010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项目“推进城乡教育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DFA100209),项目负责人:张应良。

场所。村庄衰落是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大量外流,农村经济、社会资源低效配置的萧条景象。村庄衰落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进程。在我国西部地区表现得比较突出。尽管不同地区村庄衰落的形成时间、形成路径及发展途径各异,其所处的区域和环境也不尽相同,但是它们还是具有明显的共性,具体表现在:(1)村庄农业粗放经营。耕地是农民的立身之本,农业是村庄的标识性产业,村庄衰落首先体现为农田大量荒芜、耕地粗放经营。(2)村庄人口大量迁离、房屋闲置及公共设施破败。人口是村庄构成的基本要素,也是村庄建设的主要参与者。人口的大量外迁使村庄发展主体逐渐流失。许多房屋空置、公共设施年久失修,这是村庄衰落的重要表现。(3)农村传统文化的逐渐流散。村庄的形成有着几千年历史,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品格。文化个性毫无疑问是一个民族或地方昭示其存在于必然性语境中的重要因素。随着村民迁离后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村庄民俗文化逐渐湮灭,村庄独有品格逐渐消失。(4)基层公共权威不断退化。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组织,承担着一定的政治功能,村级基层组织对村庄事务决策享有最高权威,如今却随着村落不断发展演变,基层组织公共权威正不断退化,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号召力、影响力逐渐下降,村庄治理表现出一定的失序状态。(5)村庄公共服务后续供给乏力。村庄教育、医疗、通讯等公共服务供给不仅是村民生产、生活的基本所需,还是农业生产要素在村庄范围内流动、聚集的基础条件。村庄教育资源缺失、医疗卫生水平低下、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也是其表现之一。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村情况描述

(一)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2012年对重庆市G村进行了实地调查。样本村选取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迁离规模。村庄发展的主体是农民,也是村庄建设的直接参与者。村庄劳动力迁离规模与村庄衰败有着直接的关系。二是村庄土地粗放经营。土地是村庄经济发展的主要依托资源,村庄土地粗放利用是村庄衰落的重要表现。针对村庄衰落的形成及影响,课题组采取问卷调查与半结构访谈方法于2012年11月对样本村展开了调研。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8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回收有效问卷258份。

(二)样本村基本情况描述

重庆市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中央直辖市,在我国21世纪经济与社会发展总格局和西部大开发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重庆既是大城市也是大农村,属于典型二元结构,重庆农村地区至今仍维持单一型的传统产业结构,即农村经济以农业为主体,农业又以单一的种植业为主体,而种植业又以粮食作物为主。受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历史基础及某些政策和体制因素的影响,其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农村发展及城市化水平的任务极为艰巨。

G村位于重庆市铜梁县南部的一个乡镇,距县城20公里,2007年由2个自然村合并建成,幅员面积约3.5平方公里,G村辖11个社,农户527户共1769人,外出务工人员约占全村总人口的60%,是一个以种、养殖业为主的农业村。农户主要从事水稻、玉米、红苕等农作物的生产经营。该村耕地面积2560余亩,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约2400亩,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2370亩,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为仅30余亩。退耕还林180余亩。全村有养殖专业大户4户,是一个缺水的易旱村庄。2007年村村通公路工程开始建设,2009年基本完成。目前村主干道路基本硬化。除赶集外没有公共交通工具,村民的出行主要依赖摩托车、步行或农用面包车。2010年村庄网络开通,截至目前仅有4户农户家庭在使用。村委会设有一个广播站。村民生活用水及农田灌溉用水都是取自地下水。村庄农户拥有的农业机械主要有收割机10台、耕田机15台,由于该村庄严重缺水,大部分家庭安装有微型水泵。G村庄仅设有一所幼儿园,该幼儿园设在原村庄小学(现已不复存在)教学楼最底层,园内仅有1名专业幼师教师,任教之外代收园内学费,村庄书记兼职幼儿园保安,满足约

40 余名留守儿童就读,其余较大的学龄儿童在该镇办中心小学就读。距离幼儿园不远处有一家约 20 平米的个体卫生所,这也是用于满足该村庄村民就医的唯一诊所。主治医生同时还兼职村委会会计。

三、村庄衰落的诱因

(一)城镇化与非农产业发展的不协调造成村庄发展主体虚置

村庄衰落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城市化滞后于非农产业发展是村庄衰落产生的重要根源。客观而言,积极推动城镇化建设,是努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工农产业、城乡良性互动的必然趋势。城镇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向城镇集聚,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历史演进过程,也是人口和经济活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城镇化是与工业化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空间结构转换形式,二者应相伴而行,同步推进。但是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多年来,各地农民异地流动或进城打工,有的虽然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产业工人,但他们却仍然属于城市“边缘人”,农民进城就业的身份限制并未彻底消除,新的户籍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阻碍了许多踏上城镇化道路的农村人口最终迈进城市乐园的步伐。受二元经济转型初始条件及转型过程中各利益集团博弈力量非均衡的影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特点是就地转移与非永久性乡城迁移相结合^[1],因而很多农村劳动力,仍处于“离乡未离土,进厂未进城”的状态,这就造成许多村庄发展的核心力量大规模迁离却又未能完全割断其对农村土地的依赖,最终导致村庄发展的主体出现事实上的虚置或缺失,村庄发展的核心力量缺乏或主体虚置直接导致了村庄衰落。

(二)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相对迟缓加剧了村庄衰落的步伐

村庄衰落的另一个直接诱因与农村土地产出的低效率有关。20 世纪 80 年代,逐步实行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业经营制度,实现了农业生产微观组织的重构,农户取代生产队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微观主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行表示了中国政府前所未有的要放弃对农业直接控制的愿望,也因其 80 年代初期农业的爆发式增长而受到称赞。土地制度改革赋予了农民生产自主权和收益索取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2],适应了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很好地解决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激励问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农村改革奇迹。但这一制度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中国村庄规模狭小,生产要素分散且处于静止状态,难以形成集聚效应”的农业生产规模化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制度只是对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或生产资源组织方式的简单复原^[3]。而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越稳固,条块分割的土地分散化越不能有助于以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为依托的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同时,这种非集体化的一个明显缺点是可能减少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持续投资。承包制下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仍然是模糊的,没有安全和长远的产权许诺^{[4][5]},所以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因而当非集体化能量一次释放完成之后,中国农业随后几年的不景气与减退也就被认为是情理之中的了。土地收益是村庄农业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村土地收益下降导致许多农民背井离乡、步入非农产业寻求其他可以获取更大收益的部门或行业,农村的日渐衰落也在情理之中。

(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阻碍了城乡同步发展

长期以来,政府强烈的计划经济和赶超战略色彩体制使中国实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逐渐形成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采用强制手段使城乡按照两种不同的方向发展经济:城市以工业经济为主,并以先进技术和现代化大生产要求组织生产;农村以农业经济为主,抑制其他产业的发展,并囿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我国多年发展实际上走了一条掠夺、侵占农业资源而发展工业和城市的道路,致使中国农业生产部门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的发展。最终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表现出城市现代化程度高,农村封闭落后且带有浓厚的传统特性^[6]。城乡

二元格局的推行固然有其存在的道理,或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则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农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愈来愈成为今天诸多社会痼疾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村庄衰落的主要外部影响因子。

(四) 村庄集体经济逐渐瓦解致使村级政府无力扭转村庄凋敝

以“废除”人民公社为起始拉开中国农村市场化改革序幕之后,集体经济几乎全部废除,作为“乡村善理”基础的村庄集体经济逐渐瓦解,村庄新的集体经济收入尚未形成,村级政府成为无实体经济,缺乏集体收入甚至表现为“零财政”的空壳治理机构^[7]。2011年G村农户从村集体获得的现金及实物几乎为零。全村财政收入总计只有2.5万元,其中村集体资产租赁收入约1万元,村庄约15亩果园及养殖场承包费用上交各生产队,不属于村集体收入(详见表1)。由于缺乏实体经济,集体经济不够活跃,村级组织实际可支配收入非常少,当然村级政府对村民的号召力、影响力也就逐渐丧失,而村民对村委会的运作大多也并不感兴趣,许多农户出现“消极参与”村庄治理。“零财政”,钱都没有,还能做什么事情呢?那些远在他乡打工的青壮年农民还会听村委会的召唤回来一事一议来发展村庄经济吗?所以,多数村庄,特别是距离城市较偏远的村庄,一事一议实际上就是有事不议,任由村庄凋敝下去^[7]。因而村庄集体经济收入缺失,村级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下降,村级政府根本无力扭转村庄的凋敝。

表1 2011G 村级组织财政收支情况(单位:万元,%)

一、总收入			二、总支出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1. 集体资产租赁费	1.0	40	1. 购置固定资产(电脑等)	0.50	23.9
2. 农户承包费	0	0	2. 办公费(开会、招待)	0.10	0.5
3. 镇农业专项收入	0.5	20	3. 干部工资	4.8	23.9
3. 县财政拨付工资	0.5	20	4. 文化服务中心改造	0.30	14.4
4. 自来水费代收	0.4	16	5. 自来水工程维护	0.20	9.6
5. 其他	0.1	4	6. 行政管理(如报刊杂志费)	0.04	1.9
			7. 转移支付(如慰问孤寡老人)	0.45	21.5
合计	2.5		合计	2.09	

资料来源:根据问卷调查及访谈内容整理而得

(五) 公共服务后续供给乏力阻碍了农业生产资源在村庄优化配置

农业是村庄发展的标识性产业,农业兴衰直接关系到村庄存亡。随着农产品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渐进改革措施向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迈进,农户将逐渐按照市场价格信号配置农业生产资源。然而有效价格的形成,必须依赖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备的市场信息和一整套的价格发现手段^[8]。许多村庄位于通信设施落后、交通不畅的偏远地区,村庄农产品市场发育滞后,农产品集散地的价格信号不可能及时有效地传递到村庄。样本村调研显示,绝大多数农户主要从朋友、邻居或赶集时获取当年农产品价格信息,依靠政府部门或通过电视、广播获取农产品价格信息者分别

表2 样本村农产品市场发育基本情况(N=258,%)

项目	频数	比例	项目	频数	比例	项目	频数	比例
农产品价格信息获取渠道			种子化肥等购买渠道			粮食销售渠道		
A 电视、广播	8	3.1	A 村集体购买	0	0	A 自己联系买家	32	12
B 政府相关部门	4	1.6	B 自行购买	96	37	B 商贩	180	70
C 听朋友、邻居说	76	29.5	C 直销点、代售点	6	2	C 粮站	6	2
D 赶集时得知	170	65.9	D 送货上门	156	61	D 村委会	0	0
						E 自给自足	40	16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问卷整理而得。

仅占1.6%、3.1%;通过各类经济组织或村集体来购买农户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的在样本村显示为0。样本村2010年在乡镇政府及村委会的支持下组建了唯一的农业合作组织——农友农机专

业合作社,用于专门管理农业机械使用或销售,村民可在购买农机时享受 13% 的补贴。但从对村委会的访谈得知,由于该村农户绝大多数为小户经营,粮食产量很低,农产品销售由商贩进行上门收购,同时,组建时随着壮年劳动力的不断外迁,许多参与者年事已高,在动员其参与合作组织时非常困难,最终致使合作组织在村庄的组建流于形式。2012 年接受农经站或兽医站等科技服务人员上门提供相关指导或服务工作的农户有 64 户,占调查农户的 50%,参与农民合作组织的农户只有 2 户,仅占 2%。这也再次表明尽管政府多年来通过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来增加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以支持农户农业生产,这对促进农户参与市场交易、帮助农户生产决策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支持力度或相关配套措施跟不上,并不能从根本上优化农业资源在村庄的配置。农产品价格预期无法把握,农业生产的稳定性、规模化不可能得到持续。农业生产不稳定,举办农业作为昭示村庄存在的独有属性渐渐远去,村庄逐渐衰败。

表 3 村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N=258,%)

是否参加了农民合作组织	农户	比例	科技服务人员是否提供相关指导、服务	农户数	比例
是	4	2	是	128	50
否	254	98	否	130	50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问卷整理而得。

四、村庄衰落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村庄作为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产生活的共同体,是中国农村、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器,如今却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大举导入,正在上演日益衰落的萧条景象。村庄衰落对农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一)土地粗放耕作,村庄农业持续发展动力不足

土地是村民赖以生存的唯一物质基础,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生活,还是农民安全感的直接来源。如今,随着村庄的日益衰落及非农产业的不断提高,传统的土地观在城市化、工业化面前变得支离破碎。在调研中发现样本村有 45% 农户将自家土地拿给别人无偿种植,有些农户甚至选择只要给城市户口,宁愿无偿放弃承包地。由于大量优质劳动力的向外转移,老年人成

表 4 G 村土地粗放耕作状况(N=258,%)

地耕作主体	总数(户)	比例(%)	土地耕种面积变化	总数(户)	比例(%)
A 父母	80	31.2	A 没有变化	137	52.7
B 子女	8	3.1	B 部分拿给别人种	16	6.3
C 亲戚	6	2.4	C 除了自家地还种了别人家的地	80	31.5
D 丈夫或妻子	154	60.2	D 只种平地和水田,山地给别人	18	7.1
E 其它	8	3.1	E 只有平地和水田,山地退耕还林了	6	2.4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问卷整理而得。

表 5 农户种植品种选择依据及品种变化情况(N=258,%)

农作物品种变化	总数(户)	比例(%)	农作物品种选择依据	总数(户)	比例(%)
A 没有变化	194	75.2	A 吃什么种什么	186	72.1
B 增加了	8	3.1	B 什么好卖种什么	16	6.2
C 减少了	56	21.7	C 什么产量高种什么	12	4.7
			D 凭过去经验	24	9.3
			E 看别人种什么就种什么	6	2.3
			F 什么不费劲种什么	14	5.4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问卷整理而得。

为家庭农业的主要劳动力。样本村由年迈的父母作为主要耕作主体的占 31%,尽管近 60% 的农户耕作主体是丈夫或妻子,但也仅限于季节性的种植或收割,常年田间管理主要依靠年事已高的老

人。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老年人来说,照顾家庭是其主业,土地农作反而是副业。许多农户水稻种植由过去的双季变为单季,有的还把单季稻田变为旱地甚至撂荒,形成一种耕地资源“相对过剩”的经营态势;样本村仅有 44%农户主要经济来源是种地或养殖,土地已不再是农民收入的仅有来源。同时,调研显示近 22%的农户种植品种出现明显下降,72%的农户在选择农作物种植品种时主要依据“吃什么种什么”,仅有 6%的农户选择“什么好卖种什么”。这也印证了该村庄土地经营主要用于满足农户自家需求,用于增殖的土地所占比例很小。因而那些需要投入较多人力、技术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幅减少,而管理简便、劳动投入较少、易于耕作的传统作物如小麦、玉米种植面积不断增加,由于农业种植结构趋于单一、复种指数减少,村庄大量土地呈粗放经营状况。

(二)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缺失致使现代农业发展受阻

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四化”协同发展是当今统筹城乡经济实现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而以生产率的提高,尤其是土地与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为标识的现代农业发展主要将依赖新知识的运用及对土地与劳动力替代品的发现。作为农业发展的主力军,随着大量优质劳动力的向外转移及当前我国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使得村庄剩余人口呈现弱质化构成。调研发现,农户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中劳动力缺乏占首位(见表 6)。中国农村经济近 20 年的增长主要体现为数量上的增长,这种农村经济增长质量偏低本身就是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结果,由于人力资本积累过低,不能满足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资本对劳动力匹配的需要而必将制约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也制约着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表 6 农户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困难情况

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困难(按困难程度将前三位排序)	总数(户)	比例(%)
1 青壮年劳动力缺乏	146	56.6
2 灌溉设施不足	132	51.2
3 地块过于分散	112	43.4
农资价格过高		
缺乏农业技术指导		
农产品运输渠道不畅		
来年农产品价格不好把握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问卷整理而得。

(三) 村级基层组织去功能化致使村域经济发展的动员与激励不足

在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机构不但要治理村庄社会、承接上级政府意志,还要回应外部市场对村庄及村民的影响,其宗旨应服务于村民和村集体利益,整合村庄资源,谋划、组织及实施村庄经济活动,协调村民利益,形成村庄社会秩序。随着农户家庭的相对独立,构成原来农村基层组织的生产队逐步消亡,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数量被减少到尽可能少的程度,村级组织功能逐渐弱化。样本村调研显示,该村现有农户 500 多户,人口 1 790 余人,分布于 2 个自然村。现任村委会与村党支部成员基本上属于一套人马,两个班子,且所有村委成员同时兼职于其它社会部门。事实上,村委会成员几乎将村庄治理工作当作了其工作的一部分,社会兼职收入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试想如果干部从事村庄治理工作的收入只占其总收入的小部分或村干部并不在意其来自于村庄治理工作的收入,他们也不可能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村庄治理中去,更不可能代表“经济能人”来主政。他们往往也仅做一些应付上级检查、会议、招待等简单工作。调研发现,当村民遇到纠纷时有 31%的农户并不通过寻求村委会或村干部来解决,这也说明村民已不再将村干部认作村庄秩序维护的唯一权威代表;有 62%的农户对村委会换届选举并不感兴趣,他们认为与其自身利益不大、谁当选都一样或认为村委会换届选举纯粹走形式,甚至有 80%的农户对村务公开情况根本不关心。可见村庄治理并没有引起村民的过多关注,这也进一步说明村干部在村民当中的影响力及号召力正逐渐丧失,村级治理组织逐渐边缘化和去功能化。

表 7 样本村村级政府的影响力、号召力(N=258,户,%)

项目	频数	比例	项目	频数	比例
对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认识			村民发生纠纷时,你通常选择		
A 很重要	90	34.9	A 司法途径解决	10	3.9
B 与自身利益不大,谁当选都一样	80	31.0	B 村委会或党支部调解	178	69.0
C 走形式	80	31.0	C 村民调解	66	25.6
D 其他	8	3.1	D 村里有威望的老人或族长调解	4	1.5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问卷整理而得。

(四) 公共服务后续供给乏力,农户投资与创业缺乏条件支撑

村庄衰落使村庄投资发展环境更加劣化:(1)凋敝的村庄教育资源落后,医疗、交通等公共设施及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匮乏。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充分供给不仅仅是农户获得物质的供给,还是文化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带来的直接效应是,城市人无障碍地到农村投资创业、居住,也不可避免产生直接反哺农业和农村的效应^[9]。(2)农村市场组织发展滞后,各类农村经济组织发育与创新缓慢,农户创业投资所需的信贷、农产品市场等发展环境存在先天不足,许多涉农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稳定性较差。(3)村庄投资发展环境不佳,一些非农产业在村庄的发展受阻。著名社会学家费

表 8 农户对村庄的印象及种地的看法(N=258,%)

项目	频数(户)	比例(%)	项目	频数(户)	比例(%)
对种地的看法			对本村的印象		
A 种地辛苦收入又少	172	66.7	A 村里太穷、太落后	142	55.0
B 种地较自由但收入少	44	17.1	B 村里不好挣钱	32	12.4
C 种地没出路	20	7.8	C 村庄太闭塞、不开放	14	5.4
D 种地辛苦但收入可以	6	2.3	D 村里还行	66	25.6
E 种地很好	16	6.2	E 村里将来会和城里一样	4	1.6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问卷整理而得。

表 9 外出务工成员的从业特征及务工地点(户,%,N=258)

从业特征	农户	比例	务工地点	农户	比例
纯农业	0	0	乡里	11	4.2
兼业	46	18	乡外县内	42	16.4
非农业	212	82	县外市内	86	33.3
			市外	119	46.1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问卷整理而得。

孝通先生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提出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将以农业为基础的已趋衰落的传统乡村“重建”为包含现代工业文明的工农相辅的“新农村”的乡土重建思想^[10]。非农产业的发展可以为数百万计的农户提供兼业农业的就业机会,让这部分人留下来对于村庄重建十分重要。非农产业不发展就没有兼业农业就业机会,兼业农业不发展,也就不会有多少人愿意留在农村。结果是要么农民大量向城市转移,要么在农村聚积大量的穷人。样本村的调查显示该村庄从事兼业农业的农户仅占 18%。在问到“您认为本地适合你未来创业(如办小工厂、承包土地搞开发)吗”时,仅 31%农户认为适合,而对本村及种地的印象也呈现悲观表示(见表 10)。66.7%的农

表 10 农户对村庄创业环境的认识(N=258,%)

本地经济适合你未来创业(如办小工厂、承包土地搞开发)	总数(户)	比例(%)
是	78	31
否	180	69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问卷整理而得。

户认为种地又辛苦收入又少,有 20 户农户认为种地没有出路。而对本村的印象也并未持较多的乐观认识,认为“村里太穷、太落后”,“村里不好挣钱”,“村庄太闭塞、不开放”的农户分别占 55%、

12.4%、5.4%。对外出务工成员的从业特征及务工地点也发现样本村外出务工成员放弃农业而选择从事非农产业,占样本比例为82%,而务工地点选择在离家最近的乡里的农户仅占4.2%,在县内乡外的也只有16.4%(见表9)。务工地点不在村庄周围也再次说明村庄投资环境不佳,村周边地区不能够提供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经营土地没有太多出路,村庄发展环境不好,农业或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受阻,即使村庄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也不会有多少人愿意留在村庄,最终,凋敝的村庄湮灭了大量回乡创业人员的雄心壮志,也使村庄再次步入日渐衰落的恶性循环发展轨道。

五、结论与建议

村庄衰落具备多维表现。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的不同步、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相对迟缓、村庄集体经济逐渐瓦解,基层组织公共权威退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相对匮乏是村庄衰落形成的主要诱因。村庄衰落导致农村土地进一步粗放经营,大量劳动力迁离使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缺失;村庄基层组织的去功能化、边缘化使其动员与组织能力下降;匮乏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能为农民创业与投资提供条件支持。

针对村庄衰落这一重要现实,政府应创设各种条件引导农户回归农村,通过投资农村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如学校、公路、电力供应、高质量的通讯服务),改善村庄投资发展环境,使村庄变成有吸引力的生活和工作场所。尤其要重视并提高农村教育质量,降低劳动力迁移成本。只有当农村和城镇之间劳动力、资本的转移相对自由而成本较低时,农村人口才不会大量迁离农村^[11]。其次,要积极培育多种农业经营主体。村庄农业生产主体的培育问题是当前村庄复兴,农业生产持续、有效率发展的前提。村庄衰落的另一个直接原因与农村土地产出的低效益有关,政府应大力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业比较收益,让农民真正能通过经营土地获取较高的收入。最后,应积极探索新的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增强村级基层组织的动员与激励水平,重塑基层组织公共权威,带动村庄实现内生性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我国城乡经济协调、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张桂文. 二元经济转型视角下的中国粮食安全[J]. 经济学动态,2011(6):48-51.
- [2] 黄季焜,等. 制度变迁和可持续发展——30年中国农业与农村[M].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3.
- [3] 吴丰华,白永秀. 改革主体、改革战略及其关联因素的宏观情境[J]. 改革,2012(2):18-21.
- [4] A.J.雷纳,D.科尔曼,主编. 农业经济学前沿问题[M]. 唐忠,孔祥智,译. 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279-285.
- [5] The Scope and Context of Rural Development[J].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Hodge, I.D.(1986) 13-3:271-282.
- [6] 刘斌,张兆刚,霍功. 中国三农问题报告[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12-13.
- [7] 胡靖. 村庄凋敝与集体经济[J]. 中国老区建设,2009(10):24-25.
- [8] 蔡昉. 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30年历程和经验分析[M].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7-113.
- [9] 洪银兴. 城乡差距和缩小城乡差距的优先次序[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2):5-10.
- [10] 刘长亮. “新农村建设与费孝通的乡土重建思想[J]. 城乡建设,2008(1):231-233.
- [11] D.盖尔,约翰逊. 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M]. 林毅夫,赵耀辉,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70、115、140-145.
- [12]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3] 施坚雅. 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M]. 史建云,徐秀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14] 费孝通. 江村经济[M]. 戴可景,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
- [15] 李勋来,李国平. 经济增长中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效应研究[J]. 经济科学,2005(3):39-43.

责任编辑 张颖超